

古代的人把寫作當作神聖的「立言」，因此，小說沒有地位，寫小說是文人的無恥行爲，讀小說是敗德之事，自然，也沒有人去印行小說。文人靠小說既賣不到錢，更做不到官，名利皆無。雖然寫小說是一無所得，却仍舊有人嘔心瀝血地寫小說，爲的是寄託半世牢騷和一輩子的理想。我們的幾部文學名著如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西廂記等的作者，都是歷盡世事滄桑的人傑，在人生戰場上栽了跟斗，吃了敗仗，却也不甘寂寞，把牢騷和理想編織到小說裏去，也算是一種解脫，昇華成了藝術。可以說，精誠所至，走旁門也終於成了果。

現代，小說成爲文學的一大宗派，寫小說的人被稱爲「小說家」。小說是文學作品當中最容易獲得讀者的一種形式，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小說便常常被人利用作爲換取名利的工具。因此，有的小說是文學藝術作品，而有的小說只是變相商品而已。

曲低譁衆的

污染

自從畫家開始畫裸體人像以來，藝術作品和商品的分辨便無定論。雖然人人都知道甚麼是藝術作品，可是却無法使得販賣者承認自己的東西只不過是商品。文學小說和商品小說之間的分野，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比繪畫更難以有個定論。

有些專門寫言情小說的人倒也乾脆。他們不打算混跡於文藝界，也無意自詡爲「作家」，他們志不在得美名，關起門來猛寫，磚頭小

說一部接一部，得利便可。

那些爲文學藝術而努力筆耕的人，總是很難以獲得羣衆的賞識，尤其是在這個爲錢忙、爲財死的社會裏，與文學無關的人誰有閑工夫從字裏行間去推敲，去發掘作者的原意和真情？因此，寫文學小說的作者們免不了要面對艱苦和冷落。由於歷史以及現實的教訓，這些也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最難將息的是那種介乎兩者之間的人。這種人對於文學的興趣，遠超過他們本身所

陳克環

具有的文學基礎，他們筆下所寫的遠超過他們眼睛所讀的，和他們腦子裏所思考的。基於他們對於文學所懷有的熱忱，他們在開始寫作的那段時期多半都還肯戰戰兢兢地「文藝」一番，一旦名氣大張，財神爺進了門，便搖身一變地成了小說販子，所不同的是，他們仍然打着「文藝作家」的招牌。因此，他們既發了小說販子的財，又自封為文藝小說作家，在精神與物質雙重得意之下，他們一方面從心底裏看不起那些老實實的小說販子，另一方面還可以向那些受讀者羣冷落的真真正正的文藝作家們說說風涼話。

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裏所引述瓊瑤女士的一番話：「小說可以是藝術，但必須為大眾所接受，否則曲高和寡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瓊瑤以假定語「可以」來表明小說同藝術的關係，却用肯定語「必須」來說明小說與票房的關係，很明顯的，在她心目之中，藝術與票房是貫連一氣的了。而最武斷不過的則是認為「曲高和寡是一件悲哀的事。」

小說「是」一種文學藝術是自不待言的事實，但

是一本小說是不是真正具有文學藝術價值，却絕對不是決定於它是否「為大眾所接受」。我國小說史上的幾部瑰寶，如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等，在它們寫成的那個時代，幾乎是不能公開於世的，更談不上「為大眾所接受」了。現代小說家如白先勇、王禎和、張系國、姜貴、黃春明、邵悃等人的作品，依照其票房銷路數字看來，並不「為大眾所接受」，但是誰能否認它們的文學價值？瓊瑤的小說票房價值在今日臺灣市場說來自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它們是否具有文藝價值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朽的文學作品無一不是有關人與人生的。偉大的文學家所關懷的是人類的幸福。然而，社會羣衆是愚昧而短視的，尤其是在選擇他們的精神活動方面，他們往往縱容自己的怠惰而流入粗俗和膚淺。如果我們一定要以是否被當代大眾所接受為決定一部小說的文藝價值，我們就不得不先替所謂的「大眾」來定下一個標準。如果一部小說的讀者羣十之八九都是些「愛情」泛濫，大腦簡單的少男少女，和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婆婆媽媽娘兒們，即使它能印行千百版，也不過還是屬於商品小說之流。有些小說連第一版也銷不

掉，但是，如果買這本小說的人多屬有學養之士，它仍然具有其文學價值。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以人頭來計算，或是以着迷的程度，來決定作品的價值，那麼良藥便遠不如糖果，而糖果又不如咖啡和海洛因了。

如果，一定要以「為大眾所接受」來作為衡量一部作品價值的標準，我們必須要加上時空的淘汰作為附註才算合理。能够突破時間和空間的磨損而被大眾所接受的小說，才屬於文學作品。我們少年時代讀過的一些文學作品，現在再重新去讀，二、三十年之後，反而更見其精采；它們的深度和廣度隨着讀者的學識與人生體驗而增加，也無論書中的人和事是發生於哪國哪方，都不致於令讀者與起與之毫無關連的距離感。「冰島漁夫」所述說的故事遠離我們這個地方，也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但是，讀者不自覺地會被那種氣氛所包圍，你似乎聞到了海洋的氣息，摸到島上的晨霧，感覺到漁人豐收時的欣喜，死亡常來的悲哀；當然，你更會為男女主角的愛情而心動，為他們生離死別而唏噓。無論你多少次翻開這本書，這一切都永遠鮮活朗朗地呈現在你面前，且又深深地令你感動

不已。「冰島漁夫」並非世界第一流作品，但它自有其文學價值。

反過來看，時下某些暢銷一時的小說，讀了一本，就不必讀其他的；讀一次，就不堪再翻。內容說的是當今的人和事，但是，却令人無法進入書中情況。就像瓊瑤的一系列矯情小說，男女老幼，世世代代為情憔悴，為愛糾紛不清，那些人似乎就生活在愛和情的真空匣子裏，不要說不必和社會人羣發生關係，和人生沾上點邊緣，他們呼的是愛，吸的是情，甚至於連空氣也可以不要。這一類小說的主角不能算是一人，他們的言行和思想（如果還有所謂「思想」的話）算不上「人生」。無論在中外古今的社會裏，你都找不到類似的人物來，這類小說不能附着於任何時間和空間，更不要說去突破時空而存在了。

至於那些「曲高和寡」的作者們是否真的像瓊瑤所說，覺得很悲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曲低誰眾的瓊瑤又焉知「曲高和寡」也自有一番「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天地，以供心神遨遊馳騁的呢？「莎啞娜拉·再見」的作者黃春明獲悉他的書再版之夜，固然不免興奮若狂，然而，在這之前，他也未必就悲

哀。他的快樂並非來自版稅，而主要的是欣喜於自己的作品終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他自己所說的，「在小說創作上，我是絕對贊成以真摯的人生態度為基礎底關心人、關心社會的文學。且不說道德良心，且不說道義責任，單從文學藝術產生的過程與成份來看，也就可以明白。如果從文學藝術裏面，把『人』的部份拿掉了，所剩下來的會是什麼？然而，又把『人』從『生活』，從『社會』裏面游離出來，那又會是什麼樣的『人生』啊！」。像黃春明這一流作者的作品逐漸地獲得了讀者，確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莎喲娜拉·再見」之再版，不但令得作者興奮了一晚上，文壇其他人士也會為之揚眉，吐一口氣。這畢竟證明了：讀者的欣賞水準在往上游。一個獻身文學的作者，將自己的心血澆入作品裏之後，它是否被大眾所接受的事實，所引起來的快樂和悲哀便不再僅僅是有關其個人的得失，而是與社會、國家，甚至於整個民族息息相關的。這一種從事於文學寫作的嚴肅性，自非那些以寫泡泡糖式的小說，以獲暴利的作者所能了解、接受的。

瓊瑤是個有才氣的人，她如果在「窗外」成功之

後，能够像黃春明那樣，在興奮快樂一陣子之後，便「從喜悅之中，高高地跌了下來，清清楚楚地面對一件令我感到戰慄的事實……我好像看到好幾千個人睜着眼睛瞪着我，……他們的眼神可能是一種指責，可能是一種要求，更可能是一種憤懣。……我又是多麼地需要在衆目睽睽之下，戰慄着思索，戰慄着下筆啊。」的話，她必會在文學上面有所成就。但是，在工商業社會發行與廣告的催眠術之下，她選擇了攫獲名利的快速捷徑，因而迷失了到達文學藝術之宮的方向。在一連串的「瓊瑤狂」裏，她忘記了甚麼才叫做文學價值，甚麼才是真正的快樂和悲哀。

當瓊瑤因着「窗外」走紅而開始淪入製造小說之途，文壇尚有人執筆議論她的作品，那是對她還存着一些希望而表現的一種責難式的關懷。但是，瓊瑤在她屢次發表的自白之中，表現的無非是驕傲和自滿，以自己擁有的讀者羣為武器向文壇投擲揶揄和反擊。許多年以來，文壇已不再有人提起瓊瑤或她的作品。

當瓊瑤只談財富和盛名，文壇回報以沉默的唾棄；但是一旦她大言不慚地曲解文學藝術，則自有人打破沉默，來清除這一筆污染。